

● 语言哲学

○ 西方语言哲学在中国

特约主持人：钱冠连 教授

主持人简介：钱冠连，祖籍湖北，男，1939年7月生，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外国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国著名语言学家、语言哲学家。钱先生在语用学、对比语言学等语言学领域具有极深的造诣，已经成为国内外语界语言哲学的实际带头人。学术创新或者说西方理论的本土化，一直是钱冠连先生追求的目标。

主持人话语：钱冠连文《西语哲在中国：一种可能的发展之路》的千字内容摘要，在《中国外语》2006年第一期上发表，后来在北京的“中国外语界第一届语言哲学研讨会”（2006年8月2日—6日，首都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上，他以此为题作了主题报告（全面阐述）。这里发表的略有变化。请读者注意他在此文中提出的“后分析性的语言哲学”这一概念。另外，他在此次研讨会的闭幕式上的讲话作为附录，一并发表在这里。

刘利民在《纯语言性反思与分析理性思想的端倪——先秦哲学语言关涉与名家思想取向》中指出，“只有名家盯住语言进行语言追问，他们的命题有着强烈的分析理性特征。先秦‘名实之辩’必然导致名家的诞生，而这说明，虽然汉语缺乏西方语言的句法形式化特点，但中国哲学思想中理性主义是完全可能诞生于纯语言性分析之中的”。他的这一思想与《论思维的语言操作三层次》（见本刊2006年第三期）为他提出解释名家“诡辩”诸命题的新思路奠定了理论基础。

王爱华在《语言不完备性：明达语言与语言自救》一文中讲出了这样的道理：语言的不完备性因由语言自身的明达语言维度而得以拯救。语言的不完备性和明达语言维度是一对矛盾，正是这一矛盾的辩证发展促使语言不断发展、丰富和完善，使语言成为如其所是的语言。由此，我们认为，语言的不完备性是语言自身不可分割的本质属性。如果像分析哲学家们那样将之用理想语言取代和其他分析方法治疗，就会抽掉语言的本真特质，语言也就不存在了。这一思想既非常有趣（请读者看看她举出的种种例子），却又不失深刻。

西语哲在中国：一种可能的发展之路

钱冠连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研究中心，广州 510420）

提 要：1) “西方语言哲学”指的是什么？2) 西语哲在西方。3) 西语哲在中国：不远的过去与当前。4) 西语哲在中国：寻找一种可能有效的发展之路。这个路子的大致设想是：充分挖掘与利用西方语言哲学资源中的营养与智慧，从它的老题目中发掘出新方向，不必回到堆积如山的哲学老题中去纠缠，而去关注如何将语言问题和现实的外部世界、人的行为、社会交际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起来。这样的研究如果作得好，坚持得久，可能形成一个独特的新的研究风格与潮流，这或者可以叫做“后—分析的语言哲学”，简称

“后语言哲学”。

关键词：后分析性语言哲学

中图分类号：B08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0100 (2007) 01-0001-10

1 什么是西方语言哲学

“西方语言哲学”指 20 世纪初期至 70 年代发生在西方哲学的那一场由语言性转向 (the linguistic turn) 带来的分析革命 (the analytic revolution) 和分析哲学的产物。因此,“西方语言哲学”带上了鲜明的 (语言) 分析传统。它的初衷是“以语言为手段来重铸哲学的千年老题” (Baghramian 1999: xxx)。西语哲的手段是: 在“哲学句法” (Russell 1972: 831) 的层面上操作; 西语哲的目的是: 回答“哲学的千年老题” (指 Being “存在”, the world “世界”)。

2 西语哲在西方: 过去与当前

在国外,紧跟着哲学的语言性转向与分析革命之后,便有了跟踪式的研究。对西语哲的研究,总体说来是充分的、有成效的、持续不断的。于是就有了下面的共识性评价: 认为 Frege (1952) 指称与涵义理论解决了全等问题与空名问题,是语言分析哲学的创始理论之一; 认为 Tarski (1944) 和 Carnap (1950) 等的形式语义理论是当代语义学的基础 (这种意义理论总是要求对一个陈述进行非真即假的判断,称为西哲中的二值原则); 认为 Austin (1962) 的言语行为理论, Wittgenstein (1999b,1964) 的语言使用论和 Grice (1989) 的非自然意义理论及会话含意理论促成了语用学的形成与发展 (好些以言行事是无法断其真假,尤其是话语的意义已无法从字面上判断真或假,其真正意义隐藏在说话人意图之中,从此,寻求意义的努力便冲破了二值原则); 另外,对已经成为历史的这一段潮流的深入研究,还导致了西方当代语言习得、语言产出、语言理解、语言解释甚至翻译理论的重大发展。

研究西语哲最有影响的学者之一是 Dummett (1993)。“他当初几乎是单枪匹马地从分析哲学传统奠定之初就开始追踪分析哲学的目的。近年来,他又盯住分析哲学起源的历史问题,发起了对分析哲学与大陆哲学追源索头的广泛探讨。” (Baghramian 1999: 309)

在评价与介绍分析哲学方面, Martinich 所著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 (4thed. 2001), Martinich 和 Sosa (2001) 所著 *A Companion to Analytic Philosophy*, Bob Hale and Crispin Wright 所著 *A Companion to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 (1997), Maria Baghramian (1999) 所著 *Modern Philosophy of Language*, 还有 Ayer (1982) 所著 *Philosoph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Harris (1994) 的 *Basic Topics in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 Lycan (1999) 的 *Philosophy of Language: a Contemporary Introduction* 等等,对分析传统意义上的语言哲学作了出色的梳理与评价。尤其要指出的是 Maria Baghramian 的那一本的特色: 首页的现代语言哲学的大事年表,将当时产生某一位哲学家 (及其作品) 的科学、艺术与文化事件和历史与政治事件作为背景都交待了出来,对今人理解当初为什么会出现这位哲学家及其作品很有助益。

在这些研究之中,也不乏对经典著述的修改、发展和补充,如 Davidson (20 世纪末), Burge (20 世纪 80 年代) 等的著述。Vendler (20 世纪 70 年代) 是关注语言哲学与语言学关系,并充分运用现代语言学的手段讨论语言哲学问题的重要哲学家。他认为对语言进行经验性研究来发现语言规则是语言学家的工作,而哲学家的有一部分工作是根据语言规则来发现某些分析的或必然的真 (理)。因此语言学对哲学是有帮助的。

当前西方语言哲学的发展还表现出下面几个方面的新情况。

第一，继续热衷对那段已成为历史的分析潮流进行回顾、廓清与反思，以便更好地吸取养分。除了上述“Dummett 近些年又盯住分析哲学起源的历史问题，发起了对分析哲学与大陆哲学追源索头的广泛探讨”之外，又出现了引起西方哲学家关注的最新成果。如 Scott Soames 于 2003 年出版了 *Philosophical Analysi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而且 2005 年再版，可见对他成果的反应是热烈的。他与别人的梳理不同的特点是，将那段语言性转向以后的分析潮流分为两个时期，一个叫做“分析哲学的黎明期”，另一个叫做“意义研究时期”，一眼望去就知道他对分析哲学意蕴的有特色的理解。他把 Moor 对道德论、认识论与哲学分析，把 Russell 对逻辑与语言的分析，把 Wittgenstein 的《逻辑哲学论》，把逻辑实证主义 (Logical Positivism)、情感主义 (emotivism) 与道德论，把早期的 Quine 对后逻辑实证主义的视角 (The Post-Positivist Perspective) 的研究，统统归入“分析哲学的黎明期”，而把意义研究看成是分析哲学的标志性内容，甚至可以认为是分析哲学本身，于是他将这一时期定名为“意义研究时期”。这一段时期，由如下这些研究课题形成：后期 Wittgenstein 的《哲学研究》；日常语言 (哲) 学派的经典项目——真 (并非一定是“真理”，大多数是真假之“真”——钱注)、善、心智与分析；更多的日常语言学派的经典课题——对彻底的怀疑主义 (radical skepticism) 的反应；Paul Grice 与日常语言学派的终结；Quine 的哲学自然主义；Davidson 论真与意义；最后是 Kripke 论意义与必然 (Soames 2005)。这样的两段区分，值得深究的东西有两点。第一，把此前普遍认为是分析哲学的奠基之作——Frege 的 *On Sense and Reference*——“忽略”了。第二，他对分析哲学的黎明期的理据，以及把意义作为分析哲学的“标志性建筑” (同时让其他课题不上标志榜) 的理据，也是值得一究的。

第二，西方哲学界出了一件大事：由西方 12 位当今世界一流甚至顶尖哲学家，从 2002 年 3 月至当年 9 月 3 日，投票选出了近 50 年内最重要的哲学著作，得票最多的一组，共 12 本¹。颇具启发意义的是，这 12 个人与其作品中，被认为是分析哲学家及其语言哲学作品占了一多半 (至少是 8 位，注意带*者)。他们是 (按得票顺序)：(1) *Wittgenstein, L., *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 (1953)；(2) *Quine, V., *Word and Object* (1960)；(3) *Strawson, P., *Individuals: An Essay in Descriptive Metaphysics* (1959) (中译本，江怡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年)；(4) Rawls, J., *A Theory of Justice* (1971)；(5) *Goodman, N., *Fact, Fiction and Forecast* (1954)；(6) *Kripke, S., *Naming and Necessity* (1972)；(7) Anscombe, M., *Intention* (1957)；(8) *Austin, J.L., *How to Do Things with Words* (1962)；(9) Kuhn, T.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 (1970)；(10) *Dummett, M. *The Logical Basis of Metaphysics* (1991)；(11) *Putnam, H., *The Many Faces of Realism*, (1987)；(12) Foucault, M., *The Order of Things: An Archaeology of the Human Science* (1966)。我们想一想这样的事实：语言性转向是发生在 20 世纪的初期至 20 世纪的 70 年代，按说，作为潮流的鼎盛期已经过去了近 30 年，可是最近的投票选择显示，最近 50 年内最重要的哲学家 12 位里竟有一多半 (8 位) 是分析哲学家，可见他们在当代哲学家心目中的地位是很高的，其影响也是巨大的。

第三，普遍认为，当代西方哲学的主流显然不再是以细致地分析语言为手段 (在哲学句法层面上反复展开)。为了检验这个论断是否真如所是，本文作者作了一个随机抽样调查。调查对象是三期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hilosophical Studies* (《哲学研究国际杂志》)²，2004/4 这一期上的论文共 4 篇：历史的不确定性：德里达政治学的康德背景，阿奎纳斯与现代因果论，对存在 (是 Being) 的追问：福柯的海德格尔转向，道德责任感与操作问题 (the problem of manipulation) 再思考。其他栏目内没有涉及到语言哲学。2005/1 这一期上的论文共 5 篇：汤普森·克拉克与其他心智问题 (the problem of other minds)，{ 当良心招唤时，此在 (Dasein) 还会回应吗？——海德格尔式的真实性与道德生活的可能性 }，在意义的确定论与意义的柏拉图主义的中间 (惟一的一篇讨论词语意义的论文！——钱注)，普罗蒂拉斯论同一性的存在论 (ontology)，理性空间的自然主义化。其他栏目内有一篇稍稍涉及到词语的分析，那便是：真之全等概念的真实节制 (the true modesty)：回应 Pascal Engel 的一条注释。2005/2 这一期上的论文共 4 篇：再论胡塞尔—海德格尔关系，威廉·詹姆斯论情感与

意图，{“分析的”阅读，“大陆的”文本：德里达的“论宽仁”的个案}，哈贝马斯与有效性主张（validity claims）。其他栏目内，稍稍涉及到语言分析的有：（1）“批评栏目：什么使我们探求事物的实质？对 David Charles 的批评回答，《亚里斯多德论意义与实质》”，（2）“书评栏目：达米特的《真值与过去》”。

这里的随机调查只是作了一个小小的印证：语言分析的哲学大潮是过去了，但仍有星星点点的遗迹。也可以说，西方哲学在经历了语言性转向之后，又转回了原处。

指出这一点，没有什么遗憾可言，因为主流手段的改变，丝毫没有抹去当初分析语言的哲人探索时的智慧。“又转回了原处”只是意味着不再以语言的分析为主，并不意味着当初的语言性转向只是白白地跑了一圈。解释这一点是有重要意义的。第二点“50年内最重要的哲学家12位里竟有一多半（8位）是分析哲学家”这一事实与第三点“语言分析的哲学大潮是过去了，但仍有星星点点的遗迹”这一结论看起来好像是矛盾的：既然有这么多的分析哲学家被当代的顶尖哲学家念念不忘地肯定，但语言分析手段在当代的哲学中怎么只会有星星点点的遗迹呢？其实一点也不矛盾。第二点肯定的是分析哲学家的智慧，而不是肯定他们最终解决了或者最终回答了多少哲学难题。也许这就是哲学与一般经验学科的本质区别之一：哲学中要“计算”的只是智慧，而不是彻底回答与解决了多少难题。这一点认识也许是最应该为愿意钻研哲学的外语学者所应记取的。这一认识与本文的主题——探索出西语哲在中国发展的可能有效的出路——关系极大。

针对这一认识与我们的需要而言，当代语言学对语言哲学如此丰富的成果和营养的利用和借鉴还须要加强。而有意识地将“考察和利用语言哲学的营养和智慧”作为一个专门课题来研究，目前就是在西方也还少见。另一方面，语言哲学借鉴语言学的情况更少，多数语言哲学家并不认为语言学会对哲学有什么帮助，他们的大部分工作是在评价一些经典语言哲学著述。

3 西语哲在中国：不远的过去与当前

在国内，对西语哲的研究比西方的相应工作大约推迟了二十年光景。最先开始介绍与评述西语哲的一批学者及其作品，是涂纪亮著《分析哲学及其在美国的发展》（1987）、编著《语言哲学名著选辑》（1988）、《英美语言哲学概论》（1996）、《现代西方语言哲学比较研究》（1996）；徐友渔著《哥白尼式的革命》（1994）、徐友渔等的评价性编著《语言与哲学——当代英美与德法传统比较研究》（1996）；牟博、杨音莱、韩林合等人翻译的《语言哲学》初版（1998）；杜任之主编《现代西方著名哲学家述评》，江怡主编《走向新世纪的西方哲学》（1998，2004）、江怡著《维特根斯坦：一种后哲学的文化》（1996），王路著《走进分析哲学》（1999）。这些著作对在中国传播与普及西方语言哲学起了很大作用。

《读书》杂志多年来也发表过一些学者对西语哲的介绍与评论。徐友渔等人（1996：286）在介绍西方语言哲学与欧陆哲学时，也强调了“人、语言和存在是一而三，三而一的”这一思想。无通（1993：115）认为，语言不仅是交流工具，而且是存在的根本。他说，这也许就是英美分析哲学和欧洲人文哲学共同掀起的“语言性转向”带给我们的最深刻的启示。

牟博近年来旅居美国所作的工作，值得注意，如他编著的 *Comparative Approaches to Chinese Philosophy*，对中西语言哲学的交流起了积极的作用。近年出版的陈嘉映的《语言哲学》（2003），除了介绍西方语言哲学的种种论题外，不乏作者自己的多有新见的思想与论证。

江怡从事当代西方分析哲学和语言哲学的研究和教学工作，在国内哲学界已经成为重要的学科带头人之一，并在国际哲学界崭露头角。他在分析哲学、语言哲学、维特根斯坦哲学以及当代英美与欧洲大陆哲学的比较研究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形成了自己的学术风格和重要哲学观点。关于维特根斯坦，他创造性地提出了，“应当把他的思想看作是连接

英美哲学与欧洲大陆哲学的桥梁。”他提出了“把维特根斯坦思想理解为一种后哲学文化的重要观点”（江怡 1996）。他在分析哲学方面发表了大量论文，并以分析哲学为主线完成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课题《当代英美哲学中的实在论与反实在论研究》和 8 卷本的《西方哲学史》（学术版）中的第八卷《现代英美分析哲学》（2005）。江怡在语言哲学研究中的主要观点如下：1）语言哲学研究应当是一种问题研究，它关注的不是某个哲学家的思想，而是不同的哲学家对某个或某些问题的观点；2）语言哲学研究应当以意义研究为中心；3）语言哲学研究应当被看作传统形而上学研究在现代的继续，因为语言哲学最终关注的仍然是形而上学问题；4）语言哲学是与其他哲学分支学科的研究密切相关的，特别是心灵哲学和逻辑哲学应当是语言哲学研究的主要相关学科；5）语言哲学作为一门学科，它可以与其他哲学思潮和理论相结合。

我国在分析哲学领域内卓有成就的另一位中青年哲学家是张志林（1995，2002，1991，1998，2005）。他的工作可分为两个部份。其一是对分析哲学作总体反思，并力图改进其研究方法；其二是用分析哲学提供的方法研究语言哲学和科学哲学（拓展到技术哲学）领域里的基本问题。他以问题为取向，试图有所创见。他以问题为取向的研究方法与本文的立论不谋而合。他在（1）分析哲学的反思与改进（参见他所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分析哲学运动及其遗产”），（2）意义、指称、真理，（3）因果观念与休谟问题，（4）科学解释与技术解释，（5）维特根斯坦哲学这 5 个方面，作了引人注目的工作。

能读西方语言哲学文献的一些学者，大都在大学的哲学系或中央及各个省市的社科院下属的哲学研究所工作，他们作出了许多引进、介绍以及研究工作，本文不能一一涉及。

总体上来说，中国哲学界有关西方语言哲学的工作，译著和评介比较多，批评和创造虽然也有，但比较少。这种情况，我们将在下面论及“中国哲学家提出问题的两种方式”时再次涉及到。这也是一个自然的发展阶段。

对语言哲学和当代语言学之间的对话和互惠研究就更少。这方面，钱冠连与刘宓庆的工作或可提及。他们两人几乎同时吸收西语哲营养自觉地运用在自己的研究之中。刘宓庆在 2001 年首度出版的《翻译与语言哲学》一书中，将他的翻译理论一分为三，一是研究方法论，二是哲学视角，三是价值观论。从他的“翻译理论的哲学视角”中，可以看出他充分地引用了西语哲中的意义观来构建自己的翻译学意义理论的架构，有了自己的创见。

钱冠连从 1999 年至今，发表了 10 篇西方哲学方面的系列论文，除了介绍之外，还有意识地专注于两个方面：一是西语哲给语言学带来了什么营养与智慧，二是利用西语哲的理论发展出有自己见地的横跨语言、社会与人文社科的某些问题，如工具性语言的扩展式（历史的发展、人与人之间的解释关系，见诸“论工具性语言的扩展式——西方语言哲学研究之八”，2003）、语言哲学修辞论（见诸“语言哲学修辞论：一个猜想——西方语言哲学系列研究之十”，2003）、语言哲学翻译论（见诸“语言哲学翻译论——兼论工具性语言扩展式”，2003）等等。除了系列论文（1999—2005）之外，他的新著《语言：人类最后的家园——人类基本行为的哲学与语用学研究》（2005）是对 Heidegger 的“语言是存在之居所”的研究与推进，提出“人以语言使自己出场（不仅仅是存在）。人的出场比物的出场更有意义”。该书实现了当年出版且当年再版，似乎说明读者对他这些观点与材料感受到了某种兴趣。钱冠连在这两个方面的有意的专注，如果算是一研究动向，这种动向恐怕是有某种意义的。另外，语言学界（外语界）现在有一些学者开始关注语言哲学的营养。隋然（2003，2005）和李洪儒（2001，2003）在对分析哲学的探讨中，某些评价也多有思想与创见。耿菲菲、关德妮、彭炫和温科学（2004）对语言学与语言哲学的关系和语言哲学对西方修辞学的影响等问题作了不错的甚至是中肯的分析。温科学在《20 世纪西方修辞学理论研究》（2004）中指出，“当代修辞学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劝说研究，而是与哲学思考交织在一起。修辞学复兴的理论动力是回归哲

学，以语言哲学为先导，从语言背景出发讨论意义问题，进而对修辞哲学进行新的尝试，分析修辞的本质，探讨人类修辞的动机，构建‘新修辞学’的理论框架，完成对传统修辞学的改造”。这本书就从这里出发，探索当代修辞学理论的发展历程，给中国修辞学理论建设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考空间。

4 西语哲在中国：寻找一种可能有效的发展之路

总体说来，虽然西方语言哲学和语言分析原本有一层天然密切的关系，但它与语言学(作为一个现代学科)互惠往来与对话还是不多，也不太深刻。从西语哲中有意识地吸收营养，以创造出结合中国哲学与文化的新的理论形态与新的研究风格，确实是一件立即要做的事了。特别是在当今某些语言学分支(如语用学)的研究陷入困境，无重大理论突破之际，挖掘西方语言哲学的营养与智慧，必将拓宽语言学研究视野，给语言学研究带来新的研究课题和研究方法，使语言研究不断深入，给语言学的研究发展带来新的转机。这里尤其要吸取吕叔湘(1986)批评过的一个非常不体面的现象：“过去中国没有系统的语法论著，也就没有系统的语法理论，所有理论都是外来的。外国的理论在那儿翻新，咱们也就跟着转”。“跟着转”，一跟三四十年，别人变我们变，别人不变我们不变，就像我们自己的脑袋是“白茫茫一片”，在外国理论面前，完全得了“跟着转，不自立”的失语症。每一个学科都这样覆辙重蹈，岂不是一个永恒的悲剧？当下，西方语言哲学开始在外语界引起注意并普及，从一开始就以历史教训为警，从一开始就尝试一条新的路子，一反“跟着转，不自立”之道，采取“虚心学，且自立”这样边引进边创造的路子：开始时读他的书，落脚时做我自己的事。这就是本文的立意。

这个立意，多多少少有助于提高中国 10 万之众的大学外语教师与更多语言专业硕士生与博士生的研究水平与教学水平，使他们的研究与教学具有哲学的、长远的眼光与智慧。窃以为，这在学术研究、学科建设与外语教学上，既具有长远战略意义，也不乏实践意义。

在提出符合上述“开始时读他的书，落脚时做我自己的事”的路子之前，必须思考并回答如下两个问题。第一，西语哲曾对那个时代的西方哲学、思想、文化与语言研究发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时至今日，西语哲中所研究过的问题、研究方法与理念，是否可能对现代语言研究以及一切与其相关的领域发生新的影响？如果可能，将有些什么样的影响与推动？中国语言学家、外语教师及语言专业学生可能从中吸收什么样的新智慧与营养，以便从更为基本的层次上拓展自己的研究视野？第二，从西语哲的老问题中捋出的新方向、新问题，会不会形成一种既包含最初西语哲的分析传统中的智慧，又对现代语言研究(不固定在某一个语言学的领域内)形成新的贡献这样一种新的研究风格与潮流？深入思考并回答上述两个问题，我们的思路就会变得清晰起来。

这个路子的大致设想是，充分挖掘与利用西方语言哲学资源中的营养与智慧，从它的老题目中发掘出新方向，不必回到堆积如山的哲学老题中去纠缠，而去关注如何将语言问题和现实的外部世界、人的行为、社会交际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起来。这样的研究如果作得好，坚持得久，可能形成一个独特的新的研究风格与潮流——或可叫做“后一分析的语言哲学”，简称“后语言哲学”。

简要地说，“后一分析的语言哲学”的三个方面涵义是：1) 继承与发掘分析哲学中的营养与智慧；2) 在中国文化、哲学与汉语的语境中虽然不时提起西哲的千年老题(存在、世界)，但不将它的老问题翻出来再炒作一遍，也不是老问题、老的理论帽子加上新的汉语语料这个模式，而是节外生新枝；3) 新枝(新的理论发现)落实在与现代语言研究相关的所有领域内。因此，它不是西方哲学的分支，也不是语言学的一门“学科”分支，而是从西语哲种种“问题”{如“全等陈述”(identity statements)、“空名”(empty names)、“说谎者悖论”(the liar paradox)等等}中引出来的一切与现代语言研究相关的跨学科的新的理论发现。

简言之，它不是一门新学科（因而也就没有一个学科的理论框架），而是以“问题”（某一理论）为中心的新理论发现。

西方哲学中也有与我们这里概括出来的“后—分析语言哲学”（英文试用 *post-analytic philosophy of language*）相似的说法。但是，它的涵义是特指 Putnam, Dummett, Kripke 这些人发展、修改与补充了西方上一代人如 Frege, Moore, Russell 的观点，但仍然遵守了语言分析的路数。显然这样的涵义与我们在中国文化、哲学与汉语的语境中酝酿起来的包含上述三个方面涵义的“后语言哲学”不是一回事。

本研究的定位是：不专注于现代语言学的某一个学科（因为西语哲初衷就不是为了解决语言学问题），而是与 Being（存在），the world（世界）相关的跨语言学科的多个领域。

这样研究的总体框架，基本上可以用“节外生新枝”一言以蔽之。对它的解释是，以西语哲原理论为营养与引发剂，解决与外部（物理）世界、人的行为、社会交际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种种语言问题。这样的新枝，不是执意地创立新的语言学科门类，因此不可能给出像一个学科那样的理论框架，而是发现各种新的交叉性理论，最终的理论创造成果以一个一个的“问题”（某一理论）为中心，比如以下问题：西语哲为何可以是现代语言研究的营养钵，工具性语言系统，感觉经验的不可说，中国古代哲学有无纯语言理性思维，程式性言语事件的哲学探究，语言使用中的递归现象的哲学研究，语言哲学产生新的修辞观问题，等等。我们预期，这样的交叉性理论是一个开放性的无穷尽的系统。正因为这样，这个课题没有学科意义上的章节之分，只有“问题”之分，形成系列论文。这正如当初的分析哲学也没有独特的主题与理论框架，只有一个一个问题（围绕西哲的千年老题）研究一样。

“节外生新枝”模式的具体展示是：出发点→落脚点→新的理论问题（不是原来的老问题加上汉语语料，甚至也不是给老问题找出了新的出路）。仅举两例。

第一例：当年塔尔斯基在给出真（理）之形式定义（a formal definition of truth）时，为了避免语义悖论（如“撒谎者”悖论），提出了区分工具性语言与对象语言的对策（Tarski 1944）。现在，我们可以从中提取出一个新的方向：论证出一个宏观的工具性语言系统，深刻地阐明社会的发展、人的言语行为和人与人之间的解释关系。

第二例：当年西语哲中曾有过著名的“呈现方式”（Frege 1952）、“摹状语”（Russell 1956）和“使一物出场”（Heidegger 1982a, 1982b）等研究。当今，中国的修辞学界正在试图从老的修辞思路中“突围”³，这一情况启发我们生出一个全新的方向：修辞可以看成一种哲学活动——凡是语言使用过程中，涉及呈现方式、描述属性与使一物出场时，必涉及修辞活动。这个猜想的启示是：第一，凡有认知活动并且要说话的时候，都有修辞活动；第二，人类最普遍的生存方式（使用语言）——形而下，居然和形而上的思考（哲学活动）掺和在一起；第三，人的行为、语言行为与修辞是掺和在一起的。我们生活在修辞活动之中。

为了说清这个节外生新枝的思路，很有必要联系中国哲学家提出问题的两种方式：提出一种全新的惊世骇俗的命题，给你一个全新的宇宙观、世界观与人生观；比如中国古代的老子、庄子、名家这样一些先贤提出的某些命题，至今仍然令人百思不得其一解，甚至百思不得其解；提出命题的方式，比如中国现代或当代哲人提出问题的方式是“跟随着原来文本发挥出创造性来”。下面这段叙述可以作这种方式的代表。叶秀山指出：“我们一般做哲学的，尤其是做哲学史研究的，还是要老老实实地读书，弄懂文本的意思，那么‘代’它说的‘话’，就可能既是文本要说还没有说的话，也是你自己的话。作为文本来看，它是进了一步，发展了，也许深入了……你‘跟随’着它发挥的话，同样也会是创造性的。”“这就是我们学哲学而又做历史的对于何谓‘创造性’的理解。”“对于哲学来说，‘学’字当头，‘思——创造性的思’自在其中。”（叶秀山 2002 前言：9—10）我认为这种“‘学’字当头，创造性的思自在其中”办法是可取的，尤其是值得我个人取法于中的，但我也赞成另外一种路径（它来

自西方语言哲学的普遍背景之中):“批”字当头,建立自己的新命题(不是他们自己的宣言,是我的概括)。我就此两类路径请教了三位颇有成就的中国当代哲人。有两位倾向于“跟着原来文本发挥出创造性来”,有一位倾向于“‘批’字当头,建立自己的新命题”。可是我们不得不承认,实际上,“学”字当头时也往往伴随着批判,“批”字当头时也往往伴随着继承。本文提出的新思路,第一段吸取“学字当头,创造性的思自在其中”,第二段吸取了“‘批’字当头,建立自己的新命题”的后半段,即不把自己的创造性湮没在对别人的评述与诠释之中,“跟随”原来文本一段后,理出有价值的“引子”与‘由头’旋即离开老题,产生新题目,即“大头”文章还得自己啃出来。总的来说,便是我所谓的“学字当头,生出新题。”“即节外生新枝。窃以为,以提出一种新思想新东西为目标,亦破亦立,是一种路径,(学)旧中生新,也是一种路径⁴。如果在一个阶段内不以提出新思想新东西为目标,只破不立也是允许的,这正等于根据医疗仪器作体检的医生,只指出人的病灶(只是指误,即“批字当头”),不开药方(不立),以便在另一个阶段让另外的医生开药方,是完全可以的也是必要的。

就方法论而言,归纳可以出新,演绎同样可以出新。为了符合西语哲在中国寻找出一种可能有效的发展之路,研究方法可以考虑。

第一,思辨性的研究:(西)语言哲学的来路是哲学,因此本研究也是思辨性的研究。它高度依赖辩证逻辑,也依赖形式逻辑(推理)。另一方面,本课题也可以运用猜想,等待证伪。猜想与证伪在产出重大理论上有着突出的功能。

第二,本课题有人文社科之内的跨学科性质,因此,它能借用一切人文社科所使用的方法。

第三,正因为有跨学科性质,而与语言研究结合的方面是那样的广阔,其中也可能有实证性的调查研究,这一部分必须结合语言事实,不排除调查与实证。

在以上“节外生新枝”的模式阐述的两例中,除了第三项(实证与调查)以外,思辨与一切适合于人文社科的方法大致上都用到了。

要按这种新的思路研究,我们必须作好如下的调研计划:第一,找出尽可能多的西语哲文献资料;第二,本课题的成果最终要落实到现代语言研究上,因此,除了实证性质明显的音位学与语音学以外,要调查与思考的第一组对象是传统的语法、语义学、词汇学(与词典学)、修辞、社会语言学、功能语言学(尤其是语用学)、心理语言学、人类学(文化学)、语言教学(外语教学)、中国哲学(等等)中尚未解决的问题。调查与思考的第二组对象是外部世界、人的行为、社会交际与日常生活中的现象与问题——此中尚未解决的问题我们努力解决,对已经解决的问题,提出新的视角与思路。这个过程体现了节外生新枝模式;第三,方法论方面的知识准备要尽量充分。

对于这样的新的思路来说,必须突破的重点是:(1)如何将语言问题和外部世界、人的行为、社会交际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起来,以形成一个独特的新的研究风格与潮流:“后语言哲学”(如果我们作得好,作得持久的话);(2)从西语哲种种“问题”出发,引申出以现代语言研究为基础的、跨学科的新理论“问题”来。简言之,以老问题引出新问题。

与此相关的难点,第一个方面,我们凭什么选择出西语哲中的某一个作为出发点?我们又凭什么把这个选择出来的问题,落实到现代语言研究的哪一个问题上去,即何以为落脚点?尤其是,我们凭什么有把握说我们将二者嫁接以后可以生出一种跨学科的、有理据的新理论问题来?第二个方面,这样嫁接出来的交叉性理论几乎是无穷尽的。这种无穷的嫁接要求我们的知识储备必须非常充分,这迫使我们时时更新知识,作结论时不妨如临深渊,如履薄冰。

我们可以尝试以各种路径克服这样的困难。比如,我们可以倒过来先看看现代语言学中有什么问题没有解决,然后再回头到西语哲中寻找解决问题的智慧途径;或者,将我们此前

所遇到过的种种语言学的问题存放在头脑中，一旦看到西语哲的文献中的某一个解决问题的智慧的光芒，我们就可以以这一智慧尝试去解决存放中的问题。于是，问题在于我们是否有足够的智慧。我们必须时时刻刻地问一问：当初，分析哲学家们在解决他们那个时代的头疼的争论之中的问题——如“本体论承诺”、“说谎者悖论”、“空名”等等时，用的是什么办法？这些办法的背后深藏着什么样的智慧？先是模仿，多多模仿，然后再独立地生长出自己的智慧来解决我们自己要嫁接的问题。

本课题的主要创新之处在产生出“后语言哲学”三个涵义这样的新的研究方法新的研究路径来。对此，可参阅本文“4”中的两例。

5 结束语

当下，西方语言哲学开始在外语界引起注意并普及，从一开始就以历史教训为警，从一开始就尝试一条新的路子，一反“跟着转，不自立”之道，采取“虚心学，且自立”这样边引进边创造的路子：开始时读他的书，落脚时做我自己的事。这就是本文的立意。

西方语言哲学在中国的一种可能发展之路，可设想为，充分挖掘与利用西方语言哲学资源中的营养与智慧，从它的老题目中发掘出新方向，不必回到堆积如山的哲学老题中去纠缠，而去关注如何将语言问题和现实的外部世界、人的行为、社会交际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起来。这样的研究如果作得好，坚持得久，可能形成一个独特的新的研究风格与潮流——或可叫做“后—分析的语言哲学”，简称“后语言哲学”。

“后语言哲学”的三个涵义，简言之，一是吸取西语哲的营养，二是不炒作它的老问题，三是产生以新的“问题”为中心的新理论。

这样的路子，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唯一的可行的路子。如果它是正确可行的，要真正形成气候，毫无疑问，需要一切有志于西语哲的学者的智慧与长久的努力。

注释

1 参见《个体：论描述的形而上学》，Peter Strawson，江怡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总序二，陈波。

2 杂志的主办单位：Routledge Taylor & Francis Group，编者：Maria Baghramian，爱尔兰都柏林大学哲学系高级讲师。

3 见《宗廷虎修辞论集》，吉林教育出版社，2003，第81—95页。谭学纯、朱玲，《广义修辞学》，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第14—24页。

4 甚至无中生有。老子既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又说“天地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胡适接着评论道，“道与无同是万物的母，可见道即是无，无即是道”（胡适 1997：41）。篇幅有限，无法在此展开。“无中生有”深度涉及了中国哲学，必须另外讨论。

附录

在中国外语界首届（西）语言哲学研讨会闭幕式上的讲话

§ 1.10 年以后再来评价这一次在首都师范大学召开的中国外语界首届西方语言哲学研讨会的意义与影响。§ 2. 只会外语的外语教师未必能有理论创造。§ 3. 与 50 年前相比，我

们外语界的理论水平高了许多，但是比应该达到的高度又低了许多。 § 4. 我知道大多数青年老师处在焦虑、寻觅、渴望与折磨之中。这是一个凤凰涅槃的过程。 § 5. 对年轻的新面孔朋友，我想说：我们追求不到一切，但我们能追求到管一切的一。 § 6. 对教授，尤其是没有在大会上作报告的教授，我想说：不为虚名而为作学问的快乐而活着的人，是值得学术界尊敬的。 § 7. 我们都是一群穷人。我们都是一群富人。（这是一个悖论。顺便说，什么是悖论？两个都可以找到足够证据支持的相反的命题，叫悖论。或者，“悖论是从可靠的前提或可靠的证明中产生的矛盾立场。”） § 8. 在学问上我们都是缺胳膊短腿的人，因此，别人的帮助、挑战、挑疵，对于寻求真知都是必要的。同时，互相宽容与尊重，对于繁荣科学也是必要的。 § 9. 我们需要权威，我们更须要不断地淘汰权威。 § 10. 提醒大家注意《外语学刊》与《中国外语》在促进西方语言哲学研究方面的有胆识的作为与特殊贡献。 § 11. 请大家回去传播西语哲。 § 12. 笑声与争抢话筒在哲学讨论会上是正常的。 § 13. 知识错误与缺乏智慧，哪一个更不妙？哪一个更值得我们重视？ § 14. 如何作到江郎才不尽？请到西语哲仓库中去寻找题目。 § 15. 认真读通十几篇公认的、经典的西语哲论文（Frege, Russell...），你就入门（入西语哲之门）了。 § 16. “知识就是力量”未必正确，知识加上智慧才是力量。

参考文献

- [1]Austin, J.L. “Performatives and Constatives” (chapter I) and “Conditions for Happy Performatives” (chapter II) . In *How to do things with Words* [M].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62.
- [2]Baghramian, M. *Modern Philosophy of Language, Counterpoint* [M]. P.O. Box 65793, Washington, D.C., 1999.
- [3]Bo Mou. *Comparative Approaches to Chinese Philosophy* [M]. Ashgate Publishing Company, USA, 2003.
- [4]Bob Hale & Crispin Wright. *A Companion to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 [M]. Blackwell Publishers Ltd., 1997.
- [5]Dummett, M. What do I Know when I Know a Language?[A]. In *The Seas of Language* [C].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3) ; First Published as a Paper Presented at the Centenary Celebrations, Stockholm University, May 1976.
- [6]Frege, G. On Sense and Reference[A]. In *Translations from the Philosophical Writings of Gottlob Frege* [C]. Edited by Peter Geach and Max Black, Translated by Max Black. Oxford: Blackwell, 1952.
- [7]Grice, H.P. Meaning[A]. In *Studies in the Way of Words* [C].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First appeared in *Philosophical Review*, 66(1957).
- [8]Heidegger, Martin. A Dialogue on Language[A]. In *On the Way to Language* [C]. Harper & Row, Publishers Inc., New York, N.Y. 10022. Originally Published by Verlag Gunther Neske, Pfullingen, under the Title *Unterwegs zur Sprache*, copyright 1959 by Verlag Gunther Neske. The English trans. by Harper & Row, Publishers Inc., 1982a.
- [9]Heidegger, Martin. The Nature of Language[A]. In *On the Way to Language* [C]. Harper & Row, Publishers Inc., New York, N.Y. 10022. Originally Published by Verlag Gunther Neske, Pfullingen, under the Title *Unterwegs zur Sprache*, Copyright 1959 by Verlag Gunther Neske. The English trans. by Harper & Row, Publishers Inc., 2001.
- [10]Martinich. A. P.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 (4th ed.) [C]. New York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nc., Martinich & Sosa. *A Companion to Analytic Philosophy* [M]. Blackwell Publishers Ltd., 2001.
- [11]Rudolf Carnap. Empiricism, Semantics, and Ontology[A]. In *Meaning and Necessity* [C].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Enlarged Edition, 1956. First Appeared in *Review Internationale de Philosophie*, 4 (1950) .
- [12]Russell, B. Descriptions and Incomplete Symbols[A] from *The Philosophy of Logical Atomism* in *Logic and Knowledge: Essays, 1901-1950*[C]. London: Allen & Unwin, 1956.
- [13]Russell, B. *A History of Western Philosophy* [M]. New York 10020: Simon and Schuster, 1972.

- [14]Scott Soames. *Philosophical Analysi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2d edit.)[C].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5.
- [15]Tarski, A. The Semantic Conception of Truth and the Foundations of Semantics[J]. *Philosophy and Phenomenological Research*, 1944(4).
- [16]Wittgenstein, L. *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 [M]. trans. by G. E. M. Anscombe.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Publishing House, 1999b.
- [17]Wittgenstein, L. *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M]. Copyright (c) 1953 by The Macmillan Company, Reprinted from the English Edition by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64.
- [18]陈嘉映. 语言哲学[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 [19]江 怡. 走向新世纪的西方哲学[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2004.
- [20]江 怡. 维特根斯坦: 一种后哲学的文化[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6.
- [21]胡 适. 中国哲学史大纲[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7.
- [22]李洪儒(李红儒). 从逻辑、哲学角度看句义理论的发展[J]. 外语学刊, 2001(1).
- [23]李洪儒(李红儒). 施为语句的结构-形态特征及其解读[J]. 中国俄语教学, 2003(4).
- [24]刘宓庆. 翻译与语言哲学[M]. 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2001.
- [25]吕叔湘. 《中国语法学史稿》序[A]. 龚千炎. 中国语法学史稿[M]. 北京: 语文出版社, 1986.
- [26]牟 博 杨音莱. 语言哲学[C].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8.
- [27]钱冠连. 论工具性语言的扩展式——西方语言哲学研究之八[J]. 语言科学, 2003(3).
- [28]钱冠连. 语言哲学翻译论——兼论工具性语言扩展式[J]. 中国翻译, 2003(5).
- [29]钱冠连. 语言哲学修辞论: 一个猜想——西方语言哲学系列研究之十[J]. 福建师范大学学报, 2003(6).
- [30]钱冠连. 语言: 人类最后的家园——人类基本行为的哲学与语用学研究[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5.
- [31]隋 然. 语言学研究的分析哲学方法论[A]. 来自首届中国外语教授沙龙的报告[C].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2.
- [32]隋 然. 译学研究的研究与分析哲学的分析[J]. 外国语, 2003(1).
- [33]斯特劳森. 个体[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
- [34]涂纪亮. 语言哲学名著选辑[C]. 北京: 三联出版社, 1988.
- [35]涂纪亮. 现代西方语言哲学比较研究.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6.
- [36]涂纪亮. 分析哲学及其在美国的发展[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7.
- [37]涂纪亮. 英美语言哲学概论[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6.
- [38]王 路. 走进分析哲学[M]. 北京: 北京三联书店, 1999.
- [39]无 通. 我在牛津做游戏[J]. 读书, 1993(4).
- [40]徐友渔, 周国平, 陈嘉映, 尚 杰. 语言与哲学——英美与德法传统比较研究[M]. 北京: 北京三联书店, 1996.
- [41]徐友渔. 哥白尼式的革命[M].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1994.
- [42]叶秀山. 中西智慧的贯通[A]. 叶秀山. 中国哲学文化论集[C].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2.
- [43]张志林. 分析哲学的产生与发展[M]. 香港, 1995.
- [44]张志林. 21 世纪的哲学担当 (与梁燕城对话) [J]. 加拿大《文化中国》, 2002(3).
- [45]张志林. Truth, Reference and Scientific Realism[A]. Nicholas Bunnin. In *Sino British Summer School of Philosophy: Best Examination Essays* (1998 & 1991) [C]. London and Beijing, 1991.
- [46]张志林. 因果观念与休谟问题[M]. 长沙: 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8.
- [47]张志林. 技术解释研究[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5.

A Possible Way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Western Philosophy of Language in China

Qian Guan-lian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Guangzhou 510420, China)

Abstract: 1)What does western philosophy of language (WPL, hence) refers to? 2) What is the development of WPL in the West? 3) WPL in China: the past and the future. 4)A possible way to post-analytic philosophy is that, having fully dredged up and utilized the nutrition and wisdom from WPL, we have to excavate a new orientation from the age-old philosophical problems of the West, preventing ourselves from being entangled with a mountain of the age-old ones. Instead, what we should do is that we should pay our great attention to how to closely link linguistic problems to the world, reality, activities of human beings, their social communication, finally, everyday life. If making such a kind of investigation very well and keeping it on and on, we might have gained a new style and a new trend of research, which could be called as post-analytic philosophy or post-philosophy of language.

Key words: post-analytic philosophy

基金项目: 本文系“(西)语言哲学与现代语言研究”(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项目, 批准号05JJD740178, 项目负责人为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研究中心 钱冠连)的阶段性研究成果之一。

定稿日期: 2016-10-27

[责任编辑: 李洪儒]